

CSSCI来源期刊(集刊类)

WAIGUO ZHIXUE · 29 ·

外国哲学

第二十九辑

商务印书馆

CSSCI来源期刊（集刊类）

外国哲学

第二十九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哲学.第29辑/赵敦华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560-5

I.①外… II.①赵… III.①哲学—外国—丛刊
IV.①B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105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外 国 哲 学

第二十九辑

赵敦华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1560-5

2015年9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16

201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3 1/4

定价:32.00元

执行主编的话

2014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校西方哲学教研室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召开。会议主题是:西方人如何研究哲学?中国人如何研究哲学?中国人又如何研究西方哲学?

会议围绕这三个主题,与会者以世界哲学研究的大背景为依托,反思哲学研究以及目前国内哲学研究的状况,发出哲学研究陷入危机的警告,呼吁哲学自身的改革。与会学者出于对哲学学科的热爱和使命感发出的呐喊,让人颇为动容。真是“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将这样一群普通的、无权无势的哲人视为当今中国学术的脊梁,应该不过分吧。受这种忧患意识的感染,《外国哲学》编辑部组五篇笔谈,置于“学术批评”一栏,郑重发出重新反思哲学研究的呼吁。相信阅读这组笔谈的读者,也会产生类似的共鸣。

“希腊哲学研究”一栏由两篇论文组成。李章印教授“为什么要以更古老的方式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一文,以较大的篇幅梳理近代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研究,阐释了近代最终拒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原因,提出彻底摆脱近代影响,回到希腊,按照古希腊思想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作者表明,这一尝试是基于海德格尔思想。吕纯山博士“《形而上学》对质料实体地位的三次描述”一文,以较为细腻的笔触,对《形而上学》Z3、H1以及Δ3中亚里士多德对质料实体地位的三种不同描述进行分析比较,以期证明,Z3认为质料是终极主体和实体的谓述对象,但不是这一个(τόδε τι)和分离的(ἔσχατον),而H1认为质料是潜在的(δυνάμει) τόδε τι,到Δ3中他认为质料是表面的(τῷ φαίνεσθαι) τόδε τι。作者认为,这三种描述逐步深入地刻画了质料的实体地位。

“中世纪哲学研究”收入徐龙飞教授一篇长文,“论奥古斯丁时间哲学的思维方式”。文章以洋洋洒洒三万字的篇幅,深入探讨奥古斯丁的时间学说。作者指出,奥古斯丁的时间学说,集中体现在他的名著《忏悔录》(*Confessiones*)第十一卷中,其学说的核心一言以蔽之:时间是永恒的图像(或曰肖像),上帝不仅是在时间中的永恒,而且是永恒的当下。作者尝试从语言所表述的哲思意蕴、本体形上的出发点以及认知论的基础等方面提出问题,以探讨奥古斯丁时间哲学的思维方式,希冀提示其在人文、精神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研究中所深蕴的方法论价值。

“印度哲学研究”由两篇论文组成。分别是姚卫群教授“《摄一切见论》中记述的顺世论思想”和米媛博士的“古印度几种主要的‘极微论’及其同异”。姚卫群教授指出,顺世论是古印度重要的哲学派别,但由于其独特的理论倾向而受到历史上许多派别的排斥和打压。这也导致其本派的系统文献没有流传下来。《摄一切见论》是一部记述古印度各主要哲学派别基本思想的文献。这部文献对顺世论的事物本原理论、认识论观念、社会伦理思想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记述。作者依据《摄一切见论》记述,不仅清晰地阐释顺世论主要思想,并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也证明了《摄一切见论》的史料价值有着其它文献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值得后人重视和加以特别研究。

米媛博士的“古印度几种主要的‘极微论’及其同异”探讨印度哲学中的极微概念。作者认为,“极微”观念在印度古代哲学中有重要影响。印度历史上流行的多数哲学派别都对其给予了关注。较早文献中论及极微的是耆那教。耆那教是第一个在文献中明确提出极微论的印度哲学派别。由于它注重分析事物的构成,因而它的极微观念主要包含在其对非命我的论述中。婆罗门教哲学派别中最为关注极微问题的是胜论派。胜论派是印度的一个自然哲学派别,它所说的极微的基本形态是地、水、火、风。佛教文献中也论及了极微,但不同佛教分支对此又见解不一。文章虽然简单,但也清新可人。

“日本哲学研究”有王杰博士提供的一篇论文:“日本江户时代的朱子学受容——以贝原益轩的天道思想为例”是一篇精致的论文。作者以相对丰

富的论据阐明朱子学说在日本江户时代进入日本,并且以天道思想为考察线索,通过对学问上颇具特色的贝原益轩思想的分析,考察其天道思想的思想内涵、特点、形成根源等问题,以期呈现江户时代朱子学者受容朱子学的真实面貌。由此勾勒出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发展状况。论文颇具日本哲学界文风细腻,小心求证的特点。

“青年之窗”有两篇青年新锐提供的论文:李兆勇博士所著“论前期海德格尔追问存在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孙铁根博士的“存在的超越与视域的敞开——海德格尔前期的‘现象学发现’”。两篇论文均探讨海德格尔前期思想,“论前期海德格尔追问存在问题的基本思路”探讨海德格尔前期如何解决存在问题,认为前期海德格尔采取了这样一种基本思路:首先,他通过“意向性-超越性-时间性”的三步走进程,以追问此在的存在意义;其次,通过从时间性上升到时态性,他试图由此实行“转向”,以把握存在本身之意义。这一思路隐含于相关时期的著作之中,但其困境将导致海德格尔向后期思想的转向。“存在的超越与视域的敞开——海德格尔前期的‘现象学发现’”一文更关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问题。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的前期著作是现象学的。通过对胡塞尔的范畴直观以及观念直观、一般化以及形式化等的分析,海德格尔前期才得以发现“先天超越的发生”以及“视域的敞开”,并将这样的发现贯彻到他对康德的先验哲学的解读之中。

“理论热点”是本期特意追加的内容。之所以刊登列奥·施特劳斯的两篇译文,是因为国内哲学界对列奥·施特劳斯的兴趣形成了一个小气候,大有趋之若鹜之势。这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政治哲学热和回归古典热有一定的关系。这种热,对于促进中国哲学界的施特劳斯研究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不过,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中,真正理解施特劳斯的作者还是比较有限的,误读误解者大有人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和“老友对话”(A Giving of Accounts; Jacob Klein and Leo Strauss)两篇文章文风简洁。“现代化的三次浪潮”是施特劳斯解读现代性的经典文献,虽然篇幅不大,却陈言直抒,从此这篇小文,可以清楚地看出施氏思想的立场。“老友对话”是施特劳斯和雅各·克

莱因在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一次演讲的录音稿,二人分别自述自己思想的缘起,同时阐释自己对对方的理解。这篇口语化的文章对于理解施特劳斯思想大有裨益。编辑部想通过施特劳斯自己的解说,让读者毫不费力地知晓施特劳斯学说到底想干什么。如果通过这两篇文章,推动读者进一步理解施特劳斯思想,那是再好不过的,即便不成,哪怕有些许推动也好。

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协办：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

主编：赵敦华

执行主编：杜丽燕

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卞崇道(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小文(商务印书馆)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

杜丽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傅有德(山东大学)

韩水法(北京大学)

江 怡(北京师范大学)

刘 闾(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尚新建(北京大学)

孙永平(北京大学)

徐向东(浙江大学)

姚卫群(北京大学)

张汝伦(复旦大学)

张志林(复旦大学)

赵敦华(北京大学)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

程 炼(武汉大学)

杜小真(北京大学)

冯 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韩林合(北京大学)

韩 震(北京外国语大学)

靳希平(北京大学)

倪梁康(中山大学)

孙向晨(复旦大学)

谢地坤(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树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翟振明(中山大学)

张祥龙(北京大学)

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

周晓亮(中国社会科学院)

卷 首 语

《外国哲学》于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至1998年共出版十四辑,开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研究外国哲学的新学风、新传统,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经与商务印书馆商议,从第十五辑开始,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负责承担《外国哲学》的组稿、编辑工作。

为了进一步提高《外国哲学》稿件的学术水准,我们采取了国际学术刊物通行的“双盲”审稿制度。除了继续发表对外国哲学历史和经典的诠释性论文外,本刊将特别注重发表史论结合、批判性评论、中外哲学比较等方面的佳作。我们衷心希望全国同仁鼎力襄助,不吝赐稿,把《外国哲学》办成群贤毕至、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

《外国哲学》编辑部

2002年4月

目 录

执行主编的话	(1)
--------------	-----

学术批评

尚新建 我国哲学学科亟需激进改革的一点理由	(1)
张志伟 今日哲学之危机	(8)
李 红 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困境与变革	(14)
吴天岳 向哲学史说是	(20)
瞿旭彤 在语文学和哲学之间	(31)

希腊哲学研究

李章印 为什么要以更古老方式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40)
吕纯山 《形而上学》对质料实体地位的三次描述	(54)

中世纪哲学研究

徐龙飞 论奥古斯丁时间哲学的思维方式	(68)
--------------------------	------

印度哲学研究

姚卫群 《摄一切见论》中记述的顺世论思想	(109)
米 媛 古印度几种主要的“极微论”及其同异	(121)

日本哲学研究

王 杰 日本江戸时代的朱子学受容——以贝原益轩的天道思想为例	(132)
--------------------------------------	-------

2 外国哲学

青年之窗

- 李兆勇 论前期海德格尔追问存在问题的基本
思路 (145)

- 孙铁根 存在的超越与视域的敞开——海德格尔
前期的“现象学发现” (166)

理论热点

- 列奥·施特劳斯著 郝苑译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 (180)

- 雅克·克莱因、列奥·施特劳斯著 王玉峰译
老友对话 (194)

=====

学术批评

=====

我国哲学学科亟需激进改革的一点理由

尚新建



几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举办一些学术活动并积极参与学校布置的学科建设工作,诸如,哲学系百年庆典系列活动(2012年)、庆祝外国哲学研究所建所50周年学术会议(2014年),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2012年初)、《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的讨论,《北京大学哲学系发展规划》的制定(2014年),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驱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国目前的哲学学科建设,包括哲学的教学和科研,是否亟需改革?

笔者的回答不仅是肯定的,而且特别强调需要激进的改革。不然的话,我们的哲学学科将永远落在

西方主流哲学系后面,亦步亦趋,且渐行渐远。

这样的答案并非耸人听闻,妄自菲薄,而是建立在对哲学学科性质及其变化的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一个基本估计是:西方哲学学科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却错失良机;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哲学学科从1912年建立(北大哲学门成立)到今天,仍然停留在西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水平,与西方的差距将近100年。

何以如此?

主要因为19世纪末新逻辑的诞生致使哲学的性质发生重大改变,而我们却失之交臂。

关于新逻辑对哲学的重要影响,石里克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便明确指出。当时,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演讲,其中包括“哲学的转向”(1930 年)、“哲学的未来”(1930 年、1931 年)、“新的经验哲学”(1932 年)等重要作品^①,重新探讨哲学的性质、功能、方法和范围。

在石里克看来,尽管哲学是时代和民族精神实质的体现,反映那个时代或那个民族的思维水平,但是,哲学史上不同哲学派别始终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展示该学科的最新发展成就,而只能采用历史学的方法,即借助划时代人物的名字确认和区别不同时代的哲学成就。哲学陷入的这种窘境迫使人们追问:为什么科学可以谈论其发展成果,而哲学不行?难道因为哲学处理的问题更加困难,更加艰涩?显然不是!石里克认为,症结在于人们误解了哲学的性质,无法将科学的态度与哲学的态度区别开来。从历史上看,哲学与科学同时诞生,最初并无分化,其目标都是为了寻求真理。因此那个时候可以这样表述:科学=哲学。直至 19 世纪,科学最终才从哲学分离出去。然而,人们区别哲学与科学所采用的标准通常是:

科学:发现世界的特殊真理;运用观察实验方法;

哲学:发现世界的普遍真理;运用更高的方法,如辩证法,思辨方法。

二者的区别仅在于研究范围究竟是整体还是部分:科学研究特定的对象,构成自己独特的领域,探索该领域的特殊真理;哲学则研究整体,成为探讨世界最普遍真理的科学,成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二者保留了一个共同的东西,即都是关于世界的真命题组成的体系,因而都是一门科学。今天,我们许多人仍然用这种方式理解哲学。

石里克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人们对哲学的最大误解。他试图表明,事实

^① 参见 Schlick, Moritz,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II, edited by Henk L. Mulder and Barbara F. B. van de Velde-Schlick,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其中“哲学的转向”一文有中译,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5-12 页(该文译者李德齐)。

上哲学的性质与科学截然不同:科学的目的是发现真理;哲学则不然,哲学的目的是发现意义。哲学的未来,就建立在这种区别的基础上。因此,哲学并非“关于世界的真命题的组合”,而是对命题意义的探讨。哲学的目的也不是获取真理,而是要从逻辑上澄清思想。所谓“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就是发现或规定命题的真正意义。所以,哲学是意义的探究。石里克宣称,依照这种理解建立的新哲学(即他的哲学),将结束一切哲学的纷争。用石里克的话说:“我确信我们正处在哲学上彻底的最后的转变之中,我们确实有理由把哲学体系间的无结果的争论看成结束了。”^①

问题在于:哲学何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因为发现了新的方法。石里克说:“我断言,现代已经掌握了一些方法,使每一个这样的争论在原则上成为不必要的;现在主要的只是坚决地应用这些方法。”^②什么方法?随新逻辑而来的方法,因而逻辑学的进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说的“逻辑学的进展”,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逻辑学发生的伟大革命:最初由莱布尼兹预见,后来数学家为了解决数学的基础问题(复数、导数等问题),逐渐建立了新的逻辑,其中,弗雷格、皮亚诺、希尔伯特、罗素、怀特海等人不但为新逻辑做出重要贡献,而且将这种新逻辑引入哲学,“维特根斯坦则是一直推进这个决定性转变的第一人”。^③于是,新逻辑自然成为理解新哲学的关键所在。卡尔纳普甚至认为:“面对新逻辑的无情审判,所有旧意义上的哲学,无论与柏拉图、阿奎那、康德、谢林,还是与黑格尔相关联;或者,无论是建构一种新的‘存在(Being)的形而上学’,还是‘精神哲学’,都将证明,不仅像先前的批评者坚持的那样,其内容是错误的,而且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脚,因而没有意义。”^④

新逻辑凭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①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李德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7页。

④ Carnap, Rudolf, “The Old and the New Logic”, translated by Isaac Levi, in *Logical Positivism*, edited by A. J. Ay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134.

卡尔纳普列出新逻辑的以下五大优势：^①

1. 采用符号方法,因而可以将传统逻辑的日常语言表达转换为类似数学的符号形式。其优势在于:1)表达更加清楚;2)推理更加严格,保证不让隐含的假设混入演绎过程。一旦将这种逻辑方法引入哲学,便可发现以往的许多哲学概念不能满足其严格标准,因此,或者重新对之解释,或者完全将之摒弃。

2. 大大拓展逻辑学的范围,最重要的新领域是关系命题理论和命题函项理论。卡尔纳普以关系理论为例,证明传统主谓结构只能将谓项概念(属性)归属于主项概念,无法表达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很大局限性。相反,新逻辑不仅能够界定关系,“greater than”是关系“smaller than”的逆叙,而且,能够同时规定词项的秩序。按照罗素的观点,形而上学的一些错误,应该归因于传统的主谓词逻辑。

3. 为了解决逻辑悖论问题,罗素创立的类型论,将新旧逻辑的距离进一步拉开。类型论主张,所有概念,包括属性和关系,都分为不同类型,即属于不同的阶。一阶的属性仅可以归于或否定归于个别物,但不能用于一阶或更高阶的属性;二阶的属性仅可以归于或否定归于一阶属性,但不能用于个别物或二阶或更高阶的属性,等等。以往的哲学常常混淆不同的类型,结果生出许多毫无意义的伪命题。为了避免伪命题,按照类型论,只能将 n 阶的属性仅用于 $n-1$ 阶的概念。

4. 数学成为逻辑学的一支,每一个数学概念都可以从逻辑的基本概念推演出来,因此,每个数学命题都可以翻译为纯粹逻辑概念语句。新逻辑具有以下几个最重要的概念,与对数学的逻辑分析工作密不可分:(1)否定:“非”;(2)关联:“与”、“或”、“如果-那么”;(3)“每一”(或“所有”);(4)“同一”。

5. 逻辑具有重言式特征。这种认识不仅对数学知识理论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澄清哲学问题亦举足轻重。既然所有的逻辑命题都是重言式,没有

^① 参见 Carnap, “The Old and the New Logic”, Ibid., pp.136-143.

内容,那就不能借以推演出实在世界什么是必然的,或者,什么是不可能的。因此,像黑格尔那样企图将形而上学建立在纯粹逻辑的基础上,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从以上五点不难看出,新逻辑的创立,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也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大大超越传统的逻辑。可以有把握地说,新逻辑为哲学提供更强有力的工具,其严密性、表达力和穿透力,都远胜于传统逻辑。这种新工具无疑会改变哲学的面貌。

然而,仅把新逻辑理解为一种新方法显然不够。倘若只是一件新工具,那无非是技术上的一种进步,用一种新方法代替旧方法,“就像内燃机的发明终于使飞行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一样”,却仍然无法解释哲学的本质何以发生变化。哲学的伟大转变虽然依靠新的逻辑方法才成为可能,但其根本原因并非方法,而在于更深刻的层面,即新逻辑自身的本质。逻辑是纯粹形式的,而这种纯粹形式的本质在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即是说,无论什么语言,无论什么表述方式,无论什么记号系统,都可以表达同样的知识,其中必然有共同的东西使其成为知识。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的逻辑形式。于是,“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其形式而成为知识,知识通过它的形式来陈述所知的实况,形式本身是不能再被描述出来的。形式的本质只在于知识,其余一切都是非本质的,都是表达的偶然材料,和我们用来写一个句子的墨水没有什么不同。”^①按照石里克的观点,新逻辑的形式本质重新规定了“知识”,解决了“何为知识”的问题,从而改变了对哲学本质的理解。

哲学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门科学,即不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活动体系。哲学是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心灵活动,完全不同于科学。科学的目的是探求真理。除了观察和经验科学以外,没有其它检验和证实真理的方法。哲学既然没有这种手段,因而没有单独的“哲学的”的真理领域。

^①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李德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页。

哲学的任务是使科学的命题得到澄清,科学则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则是命题的真正意义。因此,哲学的任务不是提出命题,形成命题体系,而是澄清命题的意义。石里克借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哲学的性质:“哲学的目的是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结果不是‘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①

根据石里克的这种理解,过去哲学的最严重错误之一,是非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企图用知识的形式表述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和最后内容,许多形而上学问题悬而未决,便是这种错误追求的结果。其实,不是因为人们没有能力解决形而上学问题,而是因为这些问题根本就是伪问题,或者说,根本不是问题。后来的一些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要求完全拒斥形而上学和神学,并竭力将伦理学和美学归于类似心理学那样的科学,都是这种理解的延续和发展。

尽管石里克描述的哲学的伟大转变不免有偏颇之处,但他关于新逻辑导致新哲学的预见,至少为 20 世纪英美哲学的发展所证实。哲学的分析成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和方法,逻辑和语言在哲学学科中占据核心地位。广义的分析哲学成为英美哲学学科的主流,至今仍在迅速扩展,日益盛行。这种局面绝非偶然。人们不得不承认:弗雷格、罗素等人创立的新逻辑改变了旧哲学的主题和方法,使 20 世纪哲学形成与以往哲学截然不同的某些独特性质。

然而,20 世纪逻辑学和哲学的发展,却没有为我国哲学学科所吸收。

我国创建现代哲学学科的前辈,胡适、冯友兰等人,非常重视逻辑学对于哲学的作用和力量。冯友兰先生在一篇题为“论‘唯’”的短文中开篇指出:“假如现在有人叫我开三部曲,作为‘青年必读书’,我一定开:第一部是

^① 参见 Schlick, Moritz,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II, edited by Henk L. Mulder and Barbara F. B. van de Velde-Schlick,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172.